

当代东南亚研究丛书之一

面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 改革与发展

主 编 陈乔之
副主编 庄礼伟
李金亮
侯松岭
龚泽宣

暨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1999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喜庆之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喜庆之年，同时还是中国东南亚研究会迎来建会20周年的喜庆之年。为了给国庆50周年献礼，迎接澳门回归，为了推进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事业，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受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委托，经过整整一年的积极筹备，终于在广州成功地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举办了纪念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国际研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改革与发展”。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代表共提交了近80篇学术论文。研讨会以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讨论过程气氛活跃、发言踊跃、畅所欲言。既有思想交流，也有学术切磋。与会代表普遍感到这次研讨会组织精心、议题新颖、形式活泼、内容充实，既有学术理论意义，又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收获颇大，均表示非常满意。为筹备这次研讨会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工作人员受到了高度赞扬。该所成功地举行这次研讨会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事业作出的贡献，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选题十分广泛，涉及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文化教育、民族、华人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为了全景式地反映这次研讨会的实况，我们决定以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名出版本论文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仅有少数几篇要么时效性太强，要么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距离过大，要么缺乏充分的学术性或学术规范不太严谨而难以刊用，其他绝大多数论文都被采纳并经适当修改、润色予以登载。尽管其中有些论文篇幅很长，但为了完整地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并让读者分享其学术成果，我们都尽量保留了原有篇幅。同时，考虑到既然是学术研讨，就应各抒己见，所以我们对每篇论文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未作太多修改，这并不等于我们完全同意所有论文的观点。出于尊重作者的劳动并鼓励百家争鸣的意愿，我们只好如此办理：所有论文文责自负。

在收录的论文中，大多数作者提交的是中文文稿，部分作者提交的是英文文稿。为了让中外读者能基本了解每篇论文的中心议题，凡中文稿均刊登了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而英文稿则刊登中文摘要和关键词。论文摘要（中英文）和关键词按索引方式统一编排在全文正文之后，以便读者查阅和检索。

由于收录的论文议题广泛，我们将所有入选论文依其论述的主题归并成六个专题部分和附录部分，以便读者按需查阅。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研讨会的概况，我们还转载了侯松岭副教授撰写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暨‘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一文作为附录之二。

本论文集由陈乔之担任主编，负责统揽全局，组织力量进行编辑、修订，负责对全书目录进行认真地排序，并重点对第一部分进行修改、订正，同时还负责全书终审；副主编（按姓氏笔画排序）分别是庄礼伟、李金亮、侯松岭、龚泽宣。他们分别负责有关部分的编辑修订工作，其中李金亮负责第二部分、庄礼伟负责第三部分、龚泽宣负责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编审工作、侯松岭负责第六部分和所有英文稿。英文稿摘要由侯松岭译成中文，部分中文稿因缺英文摘要（有的甚至缺少中文摘要）或因其英文摘要不合要求皆由龚泽宣、侯松岭和庄礼伟负责补齐或修改、订正。全书英文目录由侯松岭最后定稿。由于正、副主编的默契与协作，这本论文集终于得以在 2000 年 3 月完成编辑修订工作并交付暨南大学出版社。本书能顺利出版发行，与暨大出版社各位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在此一并致以谢忱！由于时间匆促，本书尚可能存在某些失误和纰漏，敬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予以指正！

陈乔之

2000 年 3 月于暨南园

目 录

前言	陈乔之 (1)
一 东南亚国家改革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试析跨世纪东南亚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特点	陈乔之 (2)
金融危机冲击下东盟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孙福生 (7)
金融危机与东南亚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	梁志明 (16)
亚洲金融危机: 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嬗变的催化剂	沈红芳 (27)
东盟国家金融改革向何处去	赵 洪 (38)
全球化时代的东盟	曹云华 (44)
东盟未来的发展趋势	梁源灵 (54)
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分析	戴可来 游明谦 (61)
文化遗产的趋动向度与东南亚社会的发展	何 颖 巫文强 (69)
二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现状与前景	
面向 21 世纪的东盟经济展望	孙恒忠 张晓阳 王志亮 (79)
影响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之一	
——国际经济中的倒置结构和虚拟化分析	李金亮 (84)
影响东南亚经济复苏的外部经济因素探析	桂久强 孙迎辰 (93)
印尼经济复苏的前提探讨	罗英祥 (97)
调整、改革、复苏	
——泰国经济如何面向 21 世纪	沈立新 (107)
世纪之交的越南经济: 问题与对策	侯松岭 (115)
东亚产业金融体制的结构、功能与局限性	张 捷 (122)
东亚模式与金融危机	杨水星 (133)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 印尼“新秩序”时期两种思潮的评论	
.....	张祖兴 (141)
试论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陈艳云 (151)
试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关系	
——东南亚五国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范若兰 (161)

三 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现状与趋向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与政治发展：现状与趋势	贺圣达 (172)
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与宗教	刘向明 (184)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模式	黄 猷 (190)
发展中的公共行政：东亚的经验与教训	庄礼伟 (193)
东南亚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政府行为	骆 莉 (199)
是“穆斯林”还是“潘查希拉” ——印尼国家指导思想的定位	林德荣 (205)
伊斯兰教与印尼政治民主化	郭继光 (213)
关于当前缅甸政局相对稳定的探讨	余定邦 (218)
红色高棉的灭亡与柬埔寨的复兴	周中坚 (224)

四 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及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韦树鲜 卿孝勇 (234)
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及趋势	张思洪 (240)
金融危机后东盟内部合作关系的发展状况与趋势	许 梅 (245)
大东盟的形成及其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	成雪峰 (252)
论国际关系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孙小迎 (259)
变化中的东盟对美关系审视	刘渝梅 (268)
世纪之交印尼局势的发展及对中印（尼）关系的影响	温北炎 (276)
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经济关系的状况与前景	李 毅 (283)
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新加坡〉韩山元 (293)
面向 21 世纪的中新关系	〈新加坡〉李励图 (300)
马中关系中的马来西亚华人因素	〈马来西亚〉李锦新 (311)
菲律宾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菲律宾〉林智聪 (322)
平等互利、共谋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越经贸关系概论	于向东 游明谦 (347)
东南亚台商与南向政策	庄国土 (358)
关于世纪之交日本对东南亚经援的几点认识	邓仕超 (366)
东盟眼中的中国改革与发展	〈新加坡〉黄朝翰 (374)
发展中的欧盟—东盟关系	马 嫫 (387)
亚欧合作与中国	张锡镇 (391)

五 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关系与华人问题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民族主义	杨保筠 (400)
缅甸民族问题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顾新华 李晨阳 (405)
金融危机与 21 世纪东南亚华人经济	黄朝晖 (414)
金融危机与华人经济前景	袁 丁 (423)
金融危机下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影响、教训和发展态势	郭 梁 (428)

21 世纪东南亚华人财团经营环境分析	刘 权 (439)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窥探	
——对世纪之交印尼华人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	杨启光 (449)
浅析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华人经济	徐义雄 (463)
诱惑与困惑：泰国正大卜蜂集团多元化经营的反思及其启示	
.....	曾彩兰 龙登高 (468)
 六 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战略与安全体制	
冷战后东盟国家的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发展趋势	陈显泗 弋 胜 (476)
试论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	陆建人 (488)
东南亚区域安全体制的现状与走势	左晓安 (496)
东盟在亚太安全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郑一省 (503)
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集体安全	潘一宁 (512)
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的经济安全形势	徐党福 (522)
 附录一 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东南亚研究	赵和曼 (529)
附录二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暨“面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	
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侯松岭 (537)
附录三 论“民主扩展”理论的思想意识渊源	龚泽宣 (542)
附录四 本论文集收录论文的英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汇编	
Appendix 4 The Topic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the Theses in This Symposium	(550)

—

东南亚国家 改革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试析跨世纪东南亚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特点

陈乔之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中国广州 510630)

一 引论

1997年夏天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地席卷了东南亚主要国家,进而冲击东亚地区,波及全球。在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是这场金融风暴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在这场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这些国家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富豪一夜之间沦为潦倒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危机已离东南亚而去,有迹象表明,东南亚多数国家1999年经济已出现止跌回升势头。但也有个别国家的情况仍很不妙,由于政局不稳,社会矛盾重重而导致经济复苏缓慢,回升乏力。1999年8月11日权威的德国德意志经济研究所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泰国经济出现了增长趋势,马来西亚有可能出现转机,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在下滑,但下滑幅度小于去年。^[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1999年泰国经济估计将增长3%~4%,2000年会提高到4%~5%的水平。^[2]马来西亚官方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该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已初获成效,经济已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并出现了复苏迹象。当地经济学家估计,1999年下半年马来西亚经济将出现明显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3%。世界银行也乐观地预测,马经济1999、2000年两年的增长率介于2%和3%之间,马政府预计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2000年达5%。^[3]至于印尼的情况,该国总统在庆祝印尼独立54周年时宣称,印尼经济开始步入复苏阶段。印尼国务部长兼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布迪奥诺更乐观表示,从1999年起,今后3个财政年度,印尼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4%、4%~6%、6%~7%,即到2002~2003年度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以上。然而,国际机构及有关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IMF亚太局局长休伯特·奈斯认为,印尼经济复苏缺乏广泛的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是否能够继续为经济复苏注入活力并进行体制和结构性改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认为,印尼在金融危机中其经济受害最深、遇到的困难也最多,例如,其他国家出现了“金融困境”,而印尼则是“金融崩溃”。所以,印尼经济复苏将是渐进的,而不会像印尼政府预计的那么快。^[4]

虽然人们对东南亚经济复苏与回升都相当关心,但是,毕竟金融危机已基本过去,现

在人们对东南亚关注的焦点已有所转移。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国家如何医治这个世纪末的灾难所留下的严重创伤、如何以改革与发展的新姿态迈向新的世纪，将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

以下，拟就跨世纪之际东南亚改革与发展的形势及其特点，作一个初步分析、探讨，同时，也将对其改革发展的趋向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作简要的阐释。

二 形势

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当然与外因有密切关系，但内因却是主要的，因为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究其内因，虽然可以罗列出许多条，但从根本来说，则是经济发展的超前与无序、体制改革的迟缓与滞后。在改革与发展这对矛盾中，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面向 21 世纪东南亚的改革与发展，势必要紧紧抓住改革这个关键不放，势必要把改革放在最优先位置上。必须充分认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谈不上发展，要发展非不断深化改革不可。这就是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关系。既然如此，在分析面向 21 世纪东南亚改革与发展的形势和特点时，我们只能把重点放在改革问题上。

跨世纪东南亚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可以用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利与弊兼而有之来加以概括。

首先，从全球范围看，其有利的一面是改革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之一，是国际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面对的头等重要的严肃课题，尤以发展中国家为然。因为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推进，都要求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必须通过改革体制与调整结构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谁不强化与深化改革，谁就会处于被动落后的状态，以致很有可能在国际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因此，改革成为一股大潮，形成一种氛围。这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改革来说，可谓千载难逢之良机。紧紧抓住这个良机，积极投身于改革事业，就可以学习和借鉴别国、别地的经验教训，至少可以少走些弯路。

然而，国际大环境对东南亚的改革也存在不那么有利的一面：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改革范本，各国的改革还得靠自己摸索。二是 IMF 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也许是最主要的改革参照系，但是这些改革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制定出来的，与各国的国情未必相符，而它又带有严厉的强制性，设定时间表，非贯彻执行不可，这对有关国家会造成颇大压力，弄得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此外，诸如金融自由化，众多金融衍生工具的涌现，国际虚拟经济大量存在，国际投机资金规模大，活动猖獗，金融风险空前增大等等，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迄今无论哪个国际组织都处于对付乏术的状态，东南亚国家就更无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此这般，足见东南亚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颇具挑战性，形势相当严峻。

再从内部条件来看。金融风暴过后，人们痛定思痛，呼唤改革的声音四起，特别是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政局稳定或相对稳定，自上而下对改革的诉求较强烈，气氛良好，泰、菲政府对 IMF 开出的改革方案几乎全盘接受，并尽力付诸实施，且已产生良好效果。这些，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化，显然是有利的。

另外，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从新加坡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经济已止跌回升，复苏在望，内外投资者逐渐恢复投资信心，社会公众也对前景表示较为乐观，这对这些国家的改革，无疑也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但是，改革毕竟是一项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驾驭整个改革，对东南亚许多政府来说决非易事，特别是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上以至思想文化上的改革。如何做好改革的规划设计，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战略，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也是富有挑战性的，此其一。其二，改革并不会对每个利益集团和个人带来好处，相反，可能会与某些利益集团和个人产生严重的冲突，这就会使改革面临抵抗和阻力。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长期地、普遍地存在“政治商业化与商业政治化”的弊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对这种弊端开刀，其可能产生的对峙是可想而知的。其三，朋党资本主义、裙带风、贪污腐败也是某些东南亚国家的顽症，针锋相对地进行改革，也可能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引发成社会政治动乱。在印尼，不就已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吗？可见，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改革的内部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改革每深化一步，就很有可能招致更加激烈的抵制和顽抗。

三 特点

从东南亚国家改革面临的形势来看，其改革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非主动性。东南亚国家所进行的这场跨世纪改革，是在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为了拯救本国经济而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要得到国际社会援助，尤其是来自 IMF 的援助，那就得接受国际组织（特别是 IMF）的改革安排。这说明，其改革并不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外来压力下非如此不可，这种改革的非主动性，决定其改革不但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必要的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是一种匆忙上阵的改革。

其二，不彻底性。正是因为这场改革并非出于自觉，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所以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做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因而很可能出现敷衍了事走过场的现象，最终导致改革的不彻底。

其三，艰巨性。东南亚国家在走向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主要借助外资（金）、外技（术）、外管（理）、外贸（出口导向）的力量，本身并未严格按照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一套办事，因此，除新加坡之外，它们基本上并没有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上存在不少弊端，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存在许多失误。加上政治民主化进程滞缓，个人崇拜，专制成风，使政治、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在经济处于顺境和上升之时，这些问题很容易被掩盖，统治阶层也因此冲昏头脑而听不进任何忠告。早在 1994 年 12 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后，一些有见地的经济学家就已指出东亚可能会发生类似墨西哥的问题，人们熟知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 1994 年就预见了东亚危机之不可避免性。他指出，东亚奇迹并不是来源于总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过高的投资、过速的资本流入、过量的人工资本输入等等。在这种模式下所造成的所谓“经济奇迹”是不会长久的。1995 年 3 月 6 日在美国出版的《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墨西哥危机之后，谁是下一个？》的评论，明确指出菲律宾、印尼、巴西、马来西亚、

泰国、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都有可能和墨西哥一样出现金融危机。同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在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项目1995年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下一个墨西哥在东亚吗？》的报告，指出菲、泰、韩、印（尼）、马等是东亚地区将要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1996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戈尔茨著文指出，随着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经济迅速增长，已出现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可能会发生类似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他还特别指出，泰国由于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赤字迅速增加，将更容易受到经济动荡和市场情况逆转的冲击。

由于当时这些东南亚国家经济仍处于上升期，所以它们的领导人谁也不把上述这些逆耳忠言当一回事。其实，当时的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只是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已。东南亚国家累积了那么多问题，说明改革将是十分艰巨的。

其四，长期性。由于东南亚国家问题经长期积累已相当严重，要解决这些日积月累起来的问题，任务当然是十分艰巨的，其进程也将是长期的。除非不想彻底解决问题，仅仅是为了走过场，否则，其改革的长期性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像印尼这样的国家，迄今为止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数仍然很多，其改革将很难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进行，改革的潜在风险还相当大，因此，其改革更是任重而道远。

四 趋向

东南亚国家的这一轮改革，可以说是刚刚开了个头，以其面临的形势和特点来看，其未来改革的趋向可作这样的概括：

第一，改革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如前所述，改革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之一，改革也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各有关国家朝野的一致要求（尽管对改革的目标速度等看法不一），因此，可以断定，改革的势头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且会逐步引向深入。

第二，改革的进程将是曲折曲折的。这也是东南亚国家改革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所决定的。因此改革面对的困难、阻力和挑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加上改革对东南亚国家都是新课题，本来就缺乏经验，也没有外来的现成方案可以照搬照套，所以，未来东南亚国家的改革进程将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是平平坦坦的，而必须走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第三，改革的速度与成效将是不平衡的。由于东南亚各国的国情不同，对这场改革所持的态度和所实施的政策不同，各国改革的内容、重点、方向、着力程度不同，加上外界，特别是国际组织对这些国家介入方式与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各国改革的速度和成效。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东南亚各国的改革会出现齐头并进的局面，而出现发展不平衡倒是极其正常的。

五 思考

东南亚各国跨世纪的改革是一场空前的必须共同面对的革命。这场改革的意义是极其

重大而深远的。因此，世人对这场改革表示高度的关注。对于东南亚国家以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都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究竟按什么模式进行改革。这是关乎改革成败得失的重大问题。IMF等国际组织能够提出的改革方案，基本是体现西方意志和利益的，按照这一“方案”改下去，就很难体现各国的具体国情，改革的结果肯定是全盘西化，因此，作为当事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其二，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牵涉到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东南亚国家的改革已到了燃眉之急，不能不摆在首要地位，并加大力度，努力推展。但是，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因此，缔造一个宽松良好的改革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改革与稳定也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来保障，没有经济上的发展，改革就丧失必要的物质基础，改革的成效也无以体现；没有经济的发展，使广大民众真正从改革、发展中获得看得到、摸得着的实际利益，那么社会的稳定也会成为问题。所以，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只有以改革为龙头、以发展为基础、以稳定作保障，改革才能顺利健康地进行。

其三，如何制订改革战略并逐渐加以实施，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改革健康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怎样才能抓住重点、难点进行改革，怎样才能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协调起来，怎样才能使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而使改革的成效大大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进行通盘的考虑和设计，形成一个改革的总体战略，并按战略部署分段实施。

其四，中国如何从东南亚国家的改革中获得启示，这也应该成为从事东南亚研究部门和国内体制改革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同属发展中地区，有许多共同的历史遭遇，在经济发展中也碰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尤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伤害了这些东南亚国家，也波及到我国，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带。所以，东南亚国家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对我国尤其沿海地区颇有借鉴作用，我们不仅要关注其改革发展的动向，而且要进行跟踪研究。

注 释：

[1] 北京：《国际商报》，1999年8月14日。

[2] 同上，1999年8月30日。

[3] 同上，1999年8月20日。

[4] 同上，1999年9月2日。

[5] 转引自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 蔡林海：《凤凰涅槃：金融风暴与亚洲新格局》，（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

[2] 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

[3] 曾牧野著：《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研究》，1997年下半年～1999年上半年各期。

[5] 北京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编：《当代亚太》，1997年下半年～1999年上半年各期。

[6] 北京中国经贸部主办：《国际商报》，1999年上半年。

金融危机冲击下东盟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孙福生

(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国厦门 361005)

自1997年爆发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无一例外地在经济上遭到重创,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也被打破,个别国家甚至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在新世纪来到时,东盟国家面临一场严重挑战:调整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政治体制,以便在建立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中巩固和提高东盟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对金融危机在东南亚产生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分析着手,重点探讨东盟国家为应付危机而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并对其前景进行评估。

一 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教训

1997年7月2日,一向被国际经济界看好,经济迅速发展的泰国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由于外汇储备枯竭无力干预汇率而被迫宣布放弃泰铢以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转为采取浮动汇率。泰铢与美元的汇率当日下跌17%。泰国货币的贬值迅速引起东南亚邻国货币“多米诺骨牌”式的贬值连锁反应。一时间,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 and 印尼盾的汇率也跟着狂泻。始发于泰国的这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稍后又波及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地区。这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冲击强烈、影响广泛,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它越出了东南亚的区域范围,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危机。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原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东盟各国无一不遭到重创。东盟国家经济危机突出表现在货币贬值,股市下泻,外汇储备锐减,国际收支恶化和投资者丧失信心上。上述现象又立即引发了银行倒闭,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猛增,从而导致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内因是主要的,当然外部因素也不应忽视,例如国际投机家的炒作,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竞争等。但有一重要外部原因不应被忽视,这就是东南亚国家经济腾飞时有利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前期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与冷战和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有关的,它为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国际资本不仅大量流向较之世界其他欠发达地区相对比较稳定的东南亚,而且,美国为了维持冷战,也为不少东南亚国家提供经

济和军事援助，用较大的经济利益换取自己的战略安全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经济利益考虑已上升到重要地位，同时，经济上已壮大起来的东盟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发生。本来可以取得的阵营内部的支持，现在却要服从于经济利益。1997年7月东盟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而正式接纳缅甸加入东盟，正巧这月发生金融风暴，因此，有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谴责西方国际投机家是借此惩罚东盟。不过，东盟接纳缅甸肯定是美国外交的失败，所以，当不听话的东盟遭到经济打击时，美国自然感到高兴。

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都对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都承认这场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与东盟国家长期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缺陷以及未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而作及时调整有密切关系。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开出的纾困方案，即一连串苛刻的紧缩预算和信用等勒紧裤带的严厉措施，并没有使东盟国家尽快摆脱危机，反而使这些国家经济萎缩和政治陷入困境。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基斯（Sachs, Jeffrey）对此也提出批评，认为此种做法将会使当地人民更加恐慌。^[1]因此，如何吸取教训和调整发展战略成为东盟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作出调整。众所周知，东南亚国家过去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现代化过程中，选择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抓住国际分工的际遇，大力吸引外资，发挥比较成本优势高速发展出口工业，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此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依靠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力量和国际市场，通过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和雇佣低廉劳动力而取得的。因此，这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存在其内在缺陷：一是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失衡；二是严重依赖外资；三是过分依靠国外市场。一旦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采取类似发展战略，自己又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本国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快速失去比较成本优势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出现出口下降，国际收支经常账目逆差扩大。为弥补逆差又必须大量吸收外资。但外资为谋取短期暴利必然会大量投向泡沫经济部门，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4、1995年的21.8%和20.1%猛降至1996年的-0.75%，贸易入超也由1995年的128.4亿美元增加为1996年的149.8亿美元。^[2]由于出口工业依赖进口部件和原材料致使进口额居高不下，从而资本经常账目逆差大增。例如，马来西亚经常账目逆差从1990年占GDP的-2.1%增至1997年的-4.0%；菲律宾同期由5.8%变为-3.9%；印尼则由-2.8%增为-4.0%；泰国由9.1%变为-8%。^[3]为弥补逆差，东盟国家不得不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国际资本为追求高额回报也纷纷挤进东南亚。东南亚国家银行和私人企业以较低利率从国外引进短期资本，再以本国较高利率转贷给本国客户谋取巨额利差。据统计资料，泰国私人企业借贷的外资从1992年占本国GDP之39%剧增至1996年的123%。^[4]到1998年2月底，印尼外债也高达1316亿美元（其中私人债务为662亿）。在有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国家因资金充裕，投机气氛极为浓厚，出现了泡沫经济。例如，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贷款大部分给了房地产业，马来西亚房地产业得到的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8%以上，印尼占20%，菲律宾占11%，泰国约占1/3。但大量造好的住宅和写字楼却绝大部分销售不出而空置，因而造成呆账，大部分企业和银行陷入困境。^[5]

其次，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有清醒认识并建立有效防范措施。东南亚各国过去不但没有对因其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调整，而且又在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防范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市场，从而为国际游资投机家的袭击创造了机会。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提高了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重要性的认识。

第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过去热衷于贸易自由化等问题，对经济全球化所引出的新问题也缺乏认识和研究，尤其是忽视建立金融监管的机制和定期交换金融信息。

二 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

遭到金融风暴冲击的东盟各国都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一切措施来应对危机和争取早日重振本国经济。东盟各国受到冲击的轻重程度不同，原来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它们采取的改革和调整措施当然就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各国的经改措施可分为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前者是应急性的，后者是为了克服引起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从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到目前，东盟国家大致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经改和调整措施：

1. 放弃固定汇率，采用浮动汇率

东盟多数国家以前均采取固定汇率，固定汇率自有其优点，例如有利于国际贸易结算，便于外国投资者估算收益从而增加投资信心等等。但是人为地把本国货币与一国强势货币挂钩并固定比价，这就削弱了挂钩国中央银行调控能力和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力，尤其在汇率发生急剧波动，本国无法维持固定汇率而改变汇率制度时，就要冒本国货币过度贬值和对外购买力大量缩水的风险。正如这次金融风暴中，人们在东南亚国家所看到的现象一样。这是因为挂钩国与被挂钩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情况不可能相同，如本国经济发展良好，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和外汇储备充足，维持固定汇率问题就不大。如情况相反，要维持汇率就必定要付出巨大代价。采取浮动制让汇率由国际货币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货币价值随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上下浮动，从而使汇率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但如实行完全自由的浮动而非有管理的浮动制，也会产生货币发行失控的严重后果。目前东盟国家大部分倾向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马来西亚与众不同，采取了外汇管制措施，将马币固定在3.80林吉特等换1美元。

2. 整顿金融机构

东盟各国在受到危机袭击后，都对本国陷入瘫痪的金融机构进行整顿。其主要措施：一是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或宣布其破产；二是整顿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或促其与其他资质良好的金融机构合并，或注入新资金进行资产重组；三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和专门处理金融债务诉讼和实施银行破产程序的司法机构。例如泰国在1997年8月就宣布对48家银行进行整顿，到年底又正式关闭65家银行。印尼在1997年11月对16家负债累累的银行宣布停止营业。1998年泰国还成立一家商业银行和一家金融机构的子公司以加强本国金融体系。马来西亚没有强行关闭银行，而是成立了国民资产有限公司和金融债务重组委员会，分别用剥离银行呆债进行管理，注入新资金和组织债权、债务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债务的办法处理和整顿金融秩序。此外，马来西亚还主要用合并银行的办法以增强银行实

力与活力。马来西亚上述措施已取得实效。

3. 调整增长指标和削减预算支出

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均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先后不断地把以前过高的预期经济增长指标下调。与此同时，政府除削减行政开支外，重点是大量削减大型建设项目而紧缩预算赤字。印尼削减了总金额高达 39 兆盾的许多大型项目。马来西亚最初也采取了 IMF 所主张的紧缩政策，但未见成效，而且造成国内经济萎缩，马币汇率和股市持续下降。1998 年 3 月，政府果断推出国民经济复苏计划，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内需，增加对农业、中低档住宅建设、教育、保健、基础建设、乡村发展和消灭贫困等项目的拨款，从而迅速扭转局面。

4. 争取国际金融机构援助

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泰国、菲律宾和印尼都在危机发生后先后要求 IMF、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紧急经济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7 年 7 月到 1998 年 4 月，菲律宾、泰国和印尼分别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财政援助为 11 亿、172 亿和 430 亿美元。上述援助虽对受援国家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受援国也被迫吞下了一帖苦药。

三 东南亚政治发展模式的出路

东南亚国家近几十年来之所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期间保持了政治和社会基本稳定，而这是与它们选择的政治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的。在危机前，东盟各国政治体制，虽保留了议会、政党、选举等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在体制上也有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印尼和菲律宾的总统制和新加坡的议会内阁制等等之不同。但实际上，不少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权力相对集中的体制，即西方学者称之为“威权主义”的体制。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苏哈托下台前的印尼都是一党独大制，执政党长期执政。新近加入东盟的越南、缅甸和老挝也不例外。泰国自 1932 年以来多数时期是军人统治，1978 年正式建立政党制和议会内阁制，但此后军人政变仍不断发生。目前泰国政治中政党影响大大加强，可是军人集团继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许多退役将军通过组建政党执政或参政。

东南亚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崇尚权威，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贤明政府和提倡和谐与团结；在社会文化上强调重视家庭与集体；在伦理道德上倡导服从和尊老爱幼。上述政治发展模式中的价值取向，都与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亚洲国家强调的“亚洲价值观”一直进行抨击，认为这是实行现代化的障碍。但过去，由于东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对起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东南亚政治发展模式，提不出令人信服的反对方论据。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许多西方学者不但断言“亚洲经济奇迹”已经终结，而且在评论金融风暴产生原因时，集中攻击东南亚的政治发展模式是导致危机产生的真正罪魁祸首，似乎东盟国家在政治上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因此而引起的社会动荡。诚然，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威权政府和行政官僚，对经济的强势管理与干预，不但有悖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且极易滋生官商勾结和贪污腐化。例如东盟不少国家存在的“人情借贷”、“优惠待遇”和金融机构大量呆

账，都是此类现象的产物。此外，过度干预也会严重扭曲资源配置，产生“泡沫经济”以及企业极度依赖政府而导致自身竞争力的萎缩，经营亏损。可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贪污腐化虽在东盟某些国家普遍存在，但东南亚还有新加坡这样世界公认的廉洁政府的客观事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以适应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要求。决定政治体制模式的因素除经济外，还有历史、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东南亚国家发展模式是其近几十年来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东南亚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发展模式目前不但未定型，而且必然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因此，这次金融风暴所暴露出的所谓“威权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等问题，与其说是东盟国家缺乏西方民主制，还不如说是法制不完善，需要东南亚传统政治文化中基本属于人治的体制尽快转变为法治。在经济不发达，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和文盲占很大比例的东盟国家，强行推行西方政治体制是完全行不通的。人们不应忘记，东南亚许多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采用过西方议会民主制模式。但在实践中，它们发现这一被西方奉为最理想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未为其带来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推动经济的发展。相反的是政府更迭频繁和社会动荡不已。例如印尼自独立到 1959 年初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内阁总理就换了 11 人。^[6]从 1950 年 8 月到 1956 年初，没有一个政党在总数为 236 个席位的国会中获得 52 席以上的席位，也从未形成一个占议会多数的大党。因此，苏加诺才在西方民主制试验失败后总结说：“这 11 年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所采用的民主是一种与印尼民族灵魂不相协调的民主，不是印尼的民主”。^[7]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强调发展中国家没有强有力政府就寸步难行，不稳定和软弱的政府只能导致混乱，不可能有发展和幸福。^[8]罗宾逊（Robison, Richard）、赫维逊（Hewison, Kewin）等西方学者在分析印尼和泰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也强调了国家的重大作用。^[9]

四 前景评估

东盟国家虽遭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由于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其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因而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客观条件。如果能正确总结经验与教训，采取必要的政策调整，利用国际经济环境提供的机遇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与调整后，东盟国家能渡过困难，重新走上较快发展道路。事实正是如此，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从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股市指数、汇率、通胀率和银行利率等经济指标看，总的来说，经济危机在东南亚已到了谷底，不少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已出现了复苏迹象。1999 年 2 月以来，东南亚与东亚一样，股市扬升趋势日显。印尼股市指数 1999 年第二季度已上涨一倍以上，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指数也大约涨了 60%。股市反弹反映危机后外流的外资已开始回流，从而推升本地币值、压低利率、拉动出口增长，进而吸引更多外资。

东盟各国虽有复苏迹象，但也要看到国内投资水平还低，消费需求也不旺，国际资本尚未大量回流，经常项目改善主要依赖于进口的减少，出口增加的预期利益却因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被抵消。同时，占东南亚投资和产品市场很大份额的经济大国日本尚未摆脱因